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析解

北京外国语学院 顾亚铃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一代文学宗匠。他与托尔斯泰各以自己的天才震撼世界,使整个欧洲注视俄罗斯。作为世界的文学巨人,他们二人与莎士比亚、但丁、歌德比肩而立。

陀氏一生创作宏富。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当首推《罪与罚》(1866)、《白痴》(1869)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氏长期经营的一部力作,酝酿达30年之久,人称他作品中的“最强音”。它反映了不同历史力量的不同声音的争辩,在哲理、社会、宗教、道德等问题上进行交锋,驳难,以复调的艺术形式构成一个关于上帝、灵魂、信仰、人类社会和未来的“大型对话”。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写的故事发生在俄国外省县城的一个偶合家庭¹中。这个家庭除先后故去的两个女主人——母亲外,共父子四人:55岁的父亲费道尔,28岁的长子德米特里,24岁的次子伊凡和19岁的幼子阿廖沙,还有一个不被社会承认的费道尔的私生子,24岁的厨仆斯梅尔佳科夫。他们之间除了淡如水的血缘关系外,家庭关系和家庭道德伦理观念已荡然无存。卡拉马佐夫一家之主费道尔,年轻时是个家产微薄的小地主,为了去阔地主家吃闲饭,不惜出乖卖丑,充当富家堂前的弄臣。他这个狡黠奸滑之徒,先靠娶妻发了一笔妻财,之后又凭手段捞钱谋财,50来岁,已是当地的一个富户。他除了贪财,就是好色,是个恶魔般的淫棍。第一个妻子身后留下儿子德米特里。第二个妻子生下了伊凡和阿廖沙。这三个孩子在他们母亲去世后,都先后成了无人照管的“孤儿”,和仆人住在下房里,蓬头垢面,混身虱子。费道尔几乎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弄不清伊凡和阿廖沙是同母所生。最后,三个孩子分别由母系的亲友接走抚养。那个到处遭人白眼的斯梅尔

佳科夫,则是费道尔和镇上一个白痴女乞的私生子。疯女临产时,越过卡拉马佐夫家的围墙,把孩子生在他家菜园里,孩子刚一坠地,她就死了。老仆人格里戈里夫妇收养了孩子,长大后当上了家里的厨仆。

德米特里中学没毕业就进了军校。服役期间,因与人决斗,受到降级处分。他酗酒放荡,挥霍无度,以致债台高筑,几次向父亲索要生母遗产,但费道尔分文不给,狂热又好冲动的德米特里立即与父亲反目为仇。伊凡半工半读念完大学,虽攻读自然科学,但对哲学、宗教、文学也颇有心得,已是小有名气的杂文撰写者。此次应哥哥德米特里之请,从莫斯科回到老家来调解父兄之间的遗产纠纷。阿廖沙在省城中学攻读,离毕业只差一年,突然回到故里,进当地的修道院当了见习修士。

虽然费道尔已年近花甲,但淫乱纵欲不减当年。他恋上了一个年轻女人格罗申卡。格罗申卡原是个遭际不幸的孤女,17岁时,多情失足,爱上了一个波兰军官,不久即遭抛弃。富商萨姆索诺夫收养了她,成了她的“保护人”。人们鄙视她,明里暗里辱骂她。这使她心中过早积蓄起了对世世的怨恨。她是个绝色俄罗斯美女,“象魔鬼般具有勾人心魄的魅力”。费道尔在做投机生意时与她邂逅,便“不顾一切地恋上了她,象疯了一般”。

德米特里和未婚妻卡捷琳娜一起回到县里。当德米特里见到格罗申卡后,也为她的姿色神魂颠倒,

1. 六七十年代,俄国社会由于农奴制的改革和资本主义的冲击,旧的道德观念受到了挑战,家庭纷纷解体,社会上出现了众多的恶性细胞——偶合家庭。它们失去了20年前贵族家庭的稳定性和明确性,成了难以称为家庭的“偶合家庭”。“偶合家庭”主题创始于陀氏。他为这类“畸形家庭”深感不安,最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家庭中年轻一代人和儿童、社会弃儿、私生子的遭际。陀氏多次在作品和论文中提出这一问题。

与父亲开始了一场荒唐、丑恶的情场角逐。格罗申卡敷衍着费道尔，心里琢磨的是他的钱财，对德米特里也“只爱过他一小时”，她周旋于两人之间，更激起他们之间无法消弭的仇恨。她要为自己早年所受的欺凌和屈辱报复，嘲弄所有追求她的男人。人们都咒骂她，唯有充满爱心的阿廖沙发现她心里的善和爱，称她为姐妹。这使格罗申卡感动得落泪，她说：阿廖沙称我姐妹，我今后永远也不会忘记！……我虽坏，却到底还施舍过一棵葱²。最后，她为德米特里对她刻骨铭心的爱所感动，真诚地爱上了他。

费道尔早已觉察到德米特里对格罗申卡的恋情。对自己垂涎已久，又似乎就在嘴边的“小鸡儿”，他岂能让德米特里夺了去。费道尔深知格罗申卡爱财，便从钱庄取出三千卢布，等待格罗申卡前来与他幽会时作为馈赠。格罗申卡模棱两可地说：“也许会去”。德米特里从斯梅尔佳科夫那里得知父亲将与格罗申卡幽会的内情。几天来，他几乎日以继夜地守候在父亲宅旁，窥伺着一切动静。但他要娶格罗申卡，首先必须在道义上摆脱未婚妻卡捷琳娜的羁绊。原来，他曾私自挪用过卡捷琳娜三千卢布，目前他急切需要这三千卢布以偿清卡捷琳娜的债务。他只得到处求告，借贷。

伊凡从莫斯科回到县城已近三月，父兄之间的遗产纠纷毫无进展，他们又因争夺格罗申卡成了情场仇敌。最后，费道尔请修道院德高望重的佐西马长老出面调停，卡拉马佐夫全家在修道院会聚。在修道院，德米特里恶语顶撞，费道尔更口出秽言亵渎神圣，父子闹到几乎要决斗。是日下午，德米特里闯入父亲费道尔家，将老人操倒在地，在他脸上连踹三脚，并扬言要打死父亲。伊凡决心次日回莫斯科，不愿继续卷在罪恶的漩涡之中。伊凡是个内心矛盾的青年，不仅在信仰上如此，对待父亲也如此。他厌恶淫荡、无耻的父亲，暗中盼他死去，但又不愿参与此事，甚至在意愿上也不允许自己有所牵连。他曾与斯梅尔佳科夫有过隐晦曲折的对话，后者觉察到了伊凡认为父亲可恨、可杀的十分隐蔽的心声。第三天，伊凡离家，他走后两小时，家里祸事就发生了：斯梅尔佳科夫“突然”跌进地窖，犯了癫痫病，“不省人事”；老仆人格里戈里病情加重卧倒在床。费道尔已等待格罗申卡好几个晚上，今晚看来她必到无疑。是日深夜，德米特里发现格罗申卡既不在老“保护人”萨姆索诺夫家，也不在她自己家，心想，她必正与费道尔欢会，一时妒火中烧，抄起桌上一把铜杵朝费

道尔家飞奔而去。他越墙跳进园内，灯火中费道尔的身影突然激起他的狂怒，他蓦地从口袋里掏出铜杵……正在此刻，仆人格里戈里支撑着病体来到园内，发现了窗前可疑的黑影。德米特里在惊慌中翻墙而逃，格里戈里抓住他的脚大喊：“杀父的家伙！”德米特里挥动铜杵，几下猛击，格里戈里无声倒下……上房和花园内发生的一切，“犯癫痫病”的斯梅尔佳科夫都听清了。他潜入费道尔室内，抄起桌上的铁镇纸，向费道尔头部三下重击，费道尔立时毙命。斯梅尔佳科夫找到费道尔准备送格罗申卡的三千卢布，塞入靴筒，又溜回下房自己的床铺，大声呻吟起来。隔板后的女仆玛尔法被斯梅尔佳科夫的呻吟声吵醒，发现丈夫格里戈里不在，赶紧跑到花园……只听见她一声惊叫……她这一喊声把凶杀案通报了全城。至此，斯梅尔佳科夫导演的德米特里“杀父谋财”案已毫无破绽地完成了。

当德米特里又奔回格罗申卡住处，才得知她已与旧情人波兰军官离去。霎时间，一切妒恨、怒火变成了绝望，他只求再见格罗申卡一面，就此了结此生。他驱车向她所在的郊外客店疾驰。格罗申卡再次见到德米特里时，为他的真诚所动，命运在向德米特里微笑，他很想活下去，但他的时间不多了。他被控“谋杀父亲”而被捕。当这桩逆伦杀父重案开庭时，伊凡推倒了德米特里的指控，指出杀人凶手是斯梅尔佳科夫，并承认，教唆他杀人的是伊凡他自己。但斯梅尔佳科夫在开庭前一天已悬梁自尽，无从对质，而且经医生检查，认为伊凡正犯严重脑炎，处于谵妄状态，供词无法律效力。在此关键时刻，卡捷琳娜提出了致德米特里于死地的“证据”。原来她已爱上了伊凡，为挽救他，她不惜牺牲德米特里。这证件是德米特里在醉酒状态下给卡捷琳娜的信，白纸黑字，似乎凿凿有据，其中说到他将杀死父亲。法庭错判德米特里为杀父凶手。后者至死不承认对父亲的死有罪，但他决心为自己过去种种荒唐、劣迹败行去受苦服刑，以期洗心革面“做一个诚实的人”。阿廖沙认为，这样的十字架对德米特里太沉重。一个营救德米特里逃亡的计划开始了……

2. 圣经中说，有个恶农妇，生前从不做善事，只给乞丐施舍过一棵葱。死后，她在地狱火海里受苦。上帝对天使说：“你就拿那棵葱拉她上天堂来吧。”天使把那棵葱伸给农妇，火海里的人见天使拉她上天堂，就抓住了她的脚，想跟她一起上天堂。她恶狠狠地用脚踢他们说：“那是我的葱，不是你们的”，这时葱忽然断了，她又跌入火海。

《卡拉马佐夫兄弟》近似一部惊险的刑侦小说。危机性事件层出不穷。它几乎采用了欧洲惊险小说流行的种种惯用情节，诸如神秘的谋杀、突如其来的财产继承、情场角逐、遗产纠纷、殃及全家的灾祸。故事颇多西方式的戏剧性和刺激。当然，陀氏在作品中引进这种种惊险小说因素，不仅为了达到“扣人心弦”和“制造悬念”的简单目的，其主旨在于将“异常的因素引进浓郁的平凡生活中”，把“崇高和怪诞结合起来”。跌宕起伏的情节在陀氏笔下是实现艺术构思的重要材料，它们同深刻而尖锐的问题、同个人隐秘而激烈的内心矛盾结合在一起。作者借助惊险的、灾难性场面来揭示人们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们矛盾和分裂的内心，达到塑造一种创始于他的“思想的人”的形象。

“在我之后，随它陆沉也罢” 检查官曾对费道尔的全部道德原则归结为法王路易十五的一句话：“在我之后，随它陆沉也罢”，也即“哪怕全世界着火，只要我一个人好就行”，一种极端自私、唯我中心的处世之道。作品中有两个专章写到费道尔的特征：“老丑角”和“色鬼”。在他心目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东西，什么都可以任意亵渎。他鄙弃信仰，灵魂里布满层层叠叠的污垢。为了牟利捞财，他使用了种种卑劣手段，既贪婪又奸诈，甚至不惜侵吞亡妻留给长子的遗产，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他荒淫享乐，嗜痂成癖地玩弄女人，在他看来“每个女人身上可以找到一点极为有趣的东西”，连镇上的白痴女乞也成了他寻找“有趣的东西”的牺牲品。他用不义之财来收买女人的欢心供他淫乐，他说：“现在我还真是汉子，只有55岁，等我老了，她们就不会甘愿到我这里来，那时就需要花钱了。我要为我自己拼命攒钱，越多越好……。”在费道尔身上集中了俄国封建农奴主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丑恶，是俄罗斯病态社会精神上的畸形者，是卡拉马佐夫气质的集中代表。

与费道尔近似的是他的私生子，自私又阴暗的灵魂——斯梅尔佳科夫。“在我之后，随它陆沉也罢”，同样也是他的信条。他长期处于卑屈的境地，郁积着难以排解的怨恨。他没有信仰和良知，只有一颗冷酷的市侩的心。为了满足私欲，他敢于杀人越货。当劫财出逃巴黎的美梦破灭后，他精神崩溃，绝望地自杀了。他至死不思悔改，在遗言中没有透露罪行的些许真相。在他身后留给世上一桩难以澄清的罪案，让人无辜蒙冤，彼此仇恨，不得安宁。他把自己对世界的怨毒都发泄在周围人的身上，把

他们都拉入罪案的漩涡中，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继续作恶。斯梅尔佳科夫和费道尔的变态的、畸形的人性特征，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费道尔是地主老财式的，而身处社会底层的斯梅尔佳科夫是小市民式的。无神论者伊凡的理论，为他犯罪找到了“合理”的立足点，于是他无所顾忌地伸出了罪恶的双手……正如评论家格罗斯曼所说，斯梅尔佳科夫是“道德上的畸形者，精神上的活尸”。

“未来人间天堂”的人物阿廖沙 与费道尔、斯梅尔佳科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幼子阿廖沙，可以说，阿廖沙和他们分别占着善和恶的两端。阿廖沙是作家心爱的形象，他理想中“未来人间天堂”的正面人物。这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吃素持斋，纯真幼稚地笃信上帝的存在和一切神的奇迹。然而，伊凡对罪恶世界的抗议、对虚妄的“和谐”的不平的呼喊，震撼了他。当伊凡讲到一个地主将军唆使一群恶狗将一个无辜农妇的孩子撕咬成碎片时，阿廖沙愤怒地说出了“枪毙”二字。伊凡忿怒的抗争声，在他忍耐、宽恕的内心“震出了裂缝”。他感到一种模糊的痛苦。佐西马长老圆寂后，奇迹希望的破灭，更使他陷入信仰的危机。但是格罗申卡一棵葱的圣典，使他悟出了更深刻的道理，他要为实现“人类最高道德理想”而献身，为基督的理想——一种“高尚的精神力量”而不懈追求。阿廖沙只递给格罗申卡“一棵葱”，却在她心底里发掘了“宝藏”。施舍一棵葱的善，却使一个灵魂得到了净化和升华。他渐渐成熟了，从一个简单地相信上帝存在的虔诚的基督徒，成长为愿为基督理想的实现而投身人间的青年。为了施舍“一棵葱”，他将在人间为千千万万“迷途”的灵魂而奔波。他热爱“上帝播下种籽的大地”，热爱人类，愿为人类受苦。他离开了修道院，还俗到了人世。在第三部第一卷结束时，阿廖沙扑倒在教堂前空旷的广场上，在“大地与天上寂静的相互融合中，拥抱大地，吻它，发誓永远爱它”。“他倒地时是个软弱的少年，站起来时却成了永生坚定的战士。”他的心紧系在俄罗斯大地和心中珍藏着基督的人民的肩膀上，与他们结合在一起，坚信“只有人民能够拯救俄罗斯”。

“始于圣母玛利亚的理想，而终于所多玛”的理想 德米特里是个具有双重人格的矛盾体。他崇敬上帝，有信仰，心灵向往圣母玛利亚的高尚理想，而肉体却炽燃着所多玛的欲望，狂热的情欲使他无力

3. 据《旧约·创世纪》记载，所多玛是淫靡之城，后毁于天火。

从所多玛罪恶的深渊中自拔。他是一个善与恶共居一体的“畸形交织”的人。他热爱生活的赐予，陶醉于生活的欢乐，但却放荡不羁，纵饮无度。他祈望人类共同携手如兄弟，走向未来的和谐，但他自己却不断做出恶德败行。他周而复始地“从纵欲走向悔恨，又从悔恨走向作恶”。他忏悔说：“我一辈子每天都在顿足捶胸，决心改过自新，但仍每天做些同样肮脏的事”，他血液里仿佛有条“色欲的虫子在兴风作浪”，使他动摇于“上帝和魔鬼之间”。他经历了复杂漫长的道路，终于达到了最后的醒悟和回归。在大难临头之际，在格罗申卡爱情力量感召下，他的灵魂经过了洗涤，精神境界升华了。为了过去的罪愆他背起了沉重的十字架，承受着弑父的罪名，决心在苦难中解救自己。他在他所称的《人之歌》中唱道：要使自己的灵魂，/从卑贱走向崇高，/就应当永远投身于古老的/大地母亲的怀抱。/他愿意从此做一个大地上、人民中普通的“农民”和“牧童”。冤案枷锁虽沉重地压在德米特里身上，但他的心灵却从所多玛深渊向光明的玛利亚理想飞升。

和上帝争辩的“叛逆者”伊凡 评论家们说：“莎士比亚笔下所有的主人公中，只有哈姆雷特能够写出他的悲剧”，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所有的主人公中，只有伊凡·卡拉马佐夫能够写出他的长篇小说”。陀氏曾说，他整部《卡拉马佐夫兄弟》都是为了伊凡所思考的问题而写的。因此，观察伊凡，倾听伊凡的声音，无论在理解作品内容思想和领悟复调艺术手法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巴赫金认为，陀氏作品中主要主人公是具有充分价值的言论载体，而作者对主人公的构思就是对主人公思想的构思。《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以复调艺术形式构筑的“思想的人”的小说，其主要人物均为艺术的思想形象，它通过具有深探心灵巨大潜力的复调艺术手段，精微地挖掘着主人公灵魂的每一个皱褶，他们最隐秘的思想、感情、潜意识、病态心理、幻想、梦境……。

伊凡是个才智非凡、博学宏达、想探知一切而痛苦求索的“思想的人”，是六七十年代俄国经历着精神危机的一代青年代表，面对着一个充满罪恶、卑污和残忍的世界，旧的精神支柱动摇了，崩溃了，上帝、信仰、社会制度、伦理道德，人类的存在和未来……不可回避地摆在思考的人们面前。伊凡是一个“不为百万家产，而要弄通思想的人”。他对阿廖沙说，他“直接而且简单地承认上帝”，他也向往人人皆兄弟

的和谐的“黄金时代”的到来，也愿有朝一日与人们同声欢呼：“主啊，你是对的！”他甚至撰文鼓吹未来的人类社会应是单一的基督教教会的“天堂”社会。然而他“不接受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而且决不能答应去接受它”，因为这个世界太冷酷、充满苦难，它“从表到里都浸透了人间的血泪”。他不愿人类用如此巨大的痛苦去换取未来“永恒的和谐”。他不相信“仁慈”的上帝会创造出如此罪孽的世界，他拒绝接受上帝天国的门票。他不相信上帝，不相信灵魂不朽，无视宗教训诫中的所谓善恶，认为人们可以“为所欲为”。

伊凡在和上帝争论人类世界和人类“永恒的和谐”的代价时，虽然言辞激烈，但内心却隐藏着矛盾，对自己“没有灵魂的不朽”，“没有道德的善恶”，“可以为所欲为”的推论动摇不定。伊凡内心矛盾的真情，唯有佐西马长老窥破了它。佐西马长老和伊凡在修道院对话时，伊凡的声音是呈双声的，在伊凡貌似坚定的声音中，清晰地可以听到、感觉到另一个隐蔽的声音，那就是他对自己“信仰”、“论证”的无奈和痛苦，困惑和游移不定。佐西马长老指出，伊凡关于灵魂不朽的问题，在伊凡心里并“没有解决”，它痛苦地“折磨”着他，而他的种种“论证”，只不过是一种“绝望的自娱”而已。

伊凡对苦难人生求索所得的结论：“可以为所欲为”，受到四周不同思想的“反射”。德米特里、阿廖沙、费道尔、佐西马长老都做出各自不同的“对话反射”。同时，它也被一个阴暗灵魂所吸收而为他所用，为他图财害命的“为所欲为”找到了“根据”。伊凡厌恶道德沦丧、作恶多端的父亲，暗中盼望他死去。他的这个若明若暗的念头下意识地影响着他的语言，他的声音似乎分裂为两个。第一个声音是不希望父亲被害——这是阿廖沙听到的声音，第二个隐蔽的声音是希望父亲被害——这是斯梅尔佳科夫听出的声音。伊凡和斯梅尔佳科夫有过几次彼此意图极为复杂、语言隐晦的对话（巴赫金认为，这些是复调对话“登峰造极”的实例，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352页，338页至353页）。伊凡的意愿双向分解，对此巴赫金作了如下归纳：

一、“我不愿父亲被害，如果发生了，那是违反我意愿的。”

二、“但是我愿意能违背我的意愿而实现，因为这样我内心也同此事毫无牵连，我对自己无可指责。”

伊凡痛苦地经历了寻求信仰、无神论、自我嘲讽、犹豫、“唆使”他人犯罪等矛盾斗争过程。残酷的现实否定了他“可以为所欲为”的结论，否定了他的“信仰”，最后在激烈的内心冲突中，他精神崩溃，丧失了正常意识活动的能力。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堪称精深博大的巨著，茨威格评论说：“作品内容宽阔无边，深不可测……涉及的问题无不同人类无法解决的问题纠合在一起。”法国作家昂烈德·马尔曼说：“在法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深深影响了一代人的智力发展。”德国有论者称，在马丁·路德之后，在德国无人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更大的精神影响。

毋庸讳言，陀氏的长篇小说并非部部都是尽善

尽美的，作品中哲理和悲剧并非处处都能完美地结合。陀氏自身和主人公的复杂性，加大了作品理解的难度。复调艺术手法使人必须仔细揣摩意在言外的对话艺术；语言结构、语调、标点符号都是有意安排的表意手段，读时不能有所疏漏。阅读陀氏小说，粗枝大叶的浏览是难得其精髓的。最后，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作家由于生活贫困和缺乏充裕的时间，无法为作品作最后的润色，甚至人物的身份、年龄、外部特征也前后不一致。正如茨威格所说：虽然陀氏“渴望完美，但他被双臂分开悬在命运的十字架上，他的有些长篇小说，还只能以尚未完成的尖塔而高耸云霄。” □

收稿日期：1992年3月17日

通讯地址：100081 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

维纳(N. Wiener)论知识分子的追求

老实说，艺术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之所以创作，应当是受到这样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所驱使：即使他们的工作没有报酬，他们也愿意付出代价来取得从事这项工作的机会。但是，我们是处在教育形式大大排挤掉教育内容的时代里，是处在教育内容正趋于日益淡薄的时代里。人们现在在取得较高学位和寻求一项可以看作文化方面的职业时，也许更多着眼于社会名气，而非着眼于任何深刻的创造冲动。

如果一位青年只是为了追求小说家的名气，而非有话要说，那他写出的第一部小说实在要叫人作呕。

——《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第八章